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女性生产运动^{*}

周锦涛

[摘要]陕甘宁边区地处偏僻落后的广大乡村,许多地方温饱都难以解决,尤其处在民族危机的抗战时期,边区面临严重的经济窘境。为了发动广大传统女性加入生产,中共将民族解放与性别解放结合起来,积极倡导女性生产运动,尤其在发动与改造女性二流子运动上,赢得了广大农村女性的支持,从而成功整合了边区农村女性社会的生产力量,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抗战胜利的后勤保障。

[关键词]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女性;生产运动

[中图分类号]K26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6)02-0044-08

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地处边陲,面对的主要是落后农村地区与广大农民。其兵源主要是农民,各种后援补充也无不来自农村,在众多青年男性参军上了前线的边区,作为群体另一半的农村女性,自然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强大潜在力量。中共深深知道,如果没有将广大的农村女性发动与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运动,要想巩固边区与取得革命的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中共对农村女性重点进行经济生产教育,提高她们的生产热情,改变农村女性的传统观念与生活习惯,提高她们的生活水平,这对中共其他一切事业至关重要。在现有对边区农村女性生产运动的研究中,主要集中于整个边区的生产运动,或重点对中共女性政策进行剖析,而对边区农村女性的主体性回应及其具体生活形态很少涉猎,本文在系统梳理中共党报《新中华报》与《解放日报》相关史料的基础上,结合已出版的各种史料,试图全面展现革命语境下女性解放与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的历史生活场景。

战争的频繁,男性劳动力的大量抽调,造成许多农村耕地的荒芜,这就不得不要求广大女性劳动者来承担。在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之前,绝大部分女性都是呆在家里为男权家庭提供服务,传统的小脚更是束缚了她们外出的自由。随着红军的到来,那套以前在南方根据地已经成熟的女性解放理论,逐渐在陕北流行开来,她们像男性一样分得了土地,在革命的旗帜下享受到了更多政治、经济、文化的权利,当然她们也被推动着去承担着相应的革命义务。在国共矛盾因抗日战争而渐趋缓和时,中共许多部队开赴抗日前线。而随着男性劳力的缺乏,耕种田地的责任自然落在了农村女性的肩上。

1937年3月,为了补充边区粮食供给,中共中央发出“紧急动员起来到春耕战线上去”的号召。边区为了彻底解决春耕中的困难和加强妇女的学习生产,于3月29日召集了各县妇女部和土地部的联席会议,讨论目前的政治形势、春耕运动及党在春耕中的任务。在抗日热潮的鼓动中,妇女代表们纷纷表示,保证不荒芜一垧耕地川地,要增加粮食收成二倍至三倍,多种早粮瓜菜二成至三成,山地要锄二次川地锄三次,妇女组、互助组要发展三分之一或二,全省还要增加开垦荒地7000亩,保

* 本文为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1900-1949:革命视野中的性别解放路径与主体性话语研究(11YBA296)”的阶段性成果。

障每个县创造一个模范区,一个至两个模范乡^①。

为了完成上级提出的生产任务,在省、县、区、乡妇女委员会的领导下,边区组建了以乡为单位的妇女春耕委员会,在各村又组织妇女学习小组,在子长、安塞、安定、延长、延水、蟠龙等地共组织了3194组,人数15051名。她们普遍参加生产,到山里砍柴、担水、打土疙瘩等。为了鼓励这种春耕热潮,各县开展了春耕竞赛,竞赛条约经由各县土地部妇女部长签名,由省一级机关负责同志公证^②。邓颖超在总结中指出“在农业生产方面,由于大批壮丁已经与继续的上前线,农村劳动力缺乏,特别要鼓励妇女参加,具体地帮助其学习耕种的技能。在各乡成立妇女学习生产小组、劳动互助小组,妇联下设有生产委员会,经常给以指导。”^③

在志丹县,经过各级检查,在各区都成立了妇女生产学习小组,保安一个区已有四五十个小组,参加的妇女有400多人,她们已纷纷投入到生产的洪流中,“确实打破了妇女不参加劳动的旧观念”^④。在子长县,经县妇女部的帮助与督促,全县共组织了320个生产学习组,共1020人,她们积极地投入到下田下地生产的热潮之中,还说,“我们要发动全苏区的妇女们都参加春耕,保证收成的增加来供给抗日的需要。”^⑤动员农村妇女参加春耕生产,发动全体妇女的竞赛热忱,“这主要是妇女部在这一运动中有计划有组织的推动了妇女工作所得来的”,蟠龙区的妇女春耕热情挺高,在十多天内就取得显著成绩,“这由边区动员的适当、检查的严格与陕西省的直接帮助下获得来的”^⑥。

同时,在春耕生产中,各区乡组织了春耕委员会,在农村组织春耕小组,为了解决劳动力缺乏的问题,以行政村为单位组织义务耕田队,还组织了拾肥料组以增加收成,农具、铁铧、锄头等由当地合作社供给,有计划、有组织地调剂籽种、耕牛,使各项问题得到解决。这也是春耕成功的重要保证之一。的确,1937年初的春耕运动是成功的,它极大地动员了边区广大妇女的生产积极性,“全边区开垦荒地45719亩(每亩约三亩),平均每一青年劳动者(包括妇女)开垦一亩田。据六个县的统计,妇女学习生产小组14501个,参加的妇女有35594人,全边区已组织了农村妇女50%参加了生产。”^⑦

随着全面抗战的开始,中共又将大批部队开往前线,这更加迫切需要男性劳动力与军粮的补充。于是到1938年的春耕生产,中共更加强调了组织的重要性。没有组织,一切都是徒然,所以边区50%以上的劳动者,均参加了劳动互助社,25%以上的妇女加入了生产学习小组,村庄普遍建立了义务代耕队。为更好领导这些组织,区乡建立了春耕委员会,专门负责督促检查工作^⑧。在安定县,从它一年来经济建设工作的总结中可以看出,先选举代表组成县的建设委员会和区乡的春耕委员会,全县有32个乡,共组织互助社276个,人数1946人;妇女生产组197组,人数1334人;义务耕田队32总队,102分队,284班,共2316人;杂务队127队,813人,自组织健全后,均起了应有作用^⑨。

在中共的每次女性政治运动中,宣传与组织是一对孪生姐妹。在强有力的组织中必须有轰轰

① 《陕西省讨论春耕运动 召开土地部妇女部联席会议》,《新中华报》1937年4月13日。

② 《陕北妇女在春耕运动——工作布置后所获的成绩》,《新中华报》1937年4月13日。

③ 邓颖超、孟庆树《关于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情况的报告》(1938年5月18日),《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页。

④ 《志丹县的妇女工作》,《新中华报》1937年4月26日。

⑤ 登云《子长县妇女参加春耕还不错》,《新中华报》1937年4月6日。

⑥ 明晶《妇女是参加春耕的模范》,《新中华报》1937年4月9日。

⑦ 邓颖超、孟庆树《关于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情况的报告》(1938年5月18日),《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第98页。

⑧ 社论《结束了,我们的春耕工作》,《新中华报》1938年7月15日。

⑨ 《安定一年来经济建设工作的总结》,《新中华报》1938年12月5日。

烈烈的宣传,如开会、做讲演、树典型、横幅、口号、教相关的歌曲等等,都是最普遍的有效宣传方式。每次运动来临前,总要召开各种大小会,总有横幅标语与鲜明的口号,然后历数日寇的罪行以激起广大妇女的民族主义与爱国热情,最后将女性解放与抗日、生产等任务结合起来,以完全达到女性动员的作用。志丹县妇女生产小组共有组员315名,她们很多是小足,但从早到晚在地上帮着干活,平均每个劳动妇女在春耕中种有5垧熟地,帮男子开荒地3垧以上。这种成绩,“一方面是各区乡妇联会的政治宣传鼓励工作;另一方面是志丹妇女们认识到今天抗战形势紧张和自己生产的意义。”^①在志丹县二区的妇女,“差不多全体参加了春耕,和男子一样劳动”^②。

同口号一样,歌曲也很容易被妇女群众接受。利用朗朗上口的歌曲来传达党的方针政策,更能激发广大妇女的爱国热情,也使党的观念深深进入千家万户。当时流行的《新春耕曲》就能表达出党的思想:“春天耕种好时光,大家一齐忙,不分老和少,耕种全为了抗战。青年壮士都要上战场,留下的土地由妇女和儿童,共同协助来耕种。”^③在新创的陕北秧歌中,更能体现出中共对农村女性的教育引导方向与当时的女性生活,其中一首是“各位你们听仔细,如今女人也顶事。分得了土地打粮食,不愁穿来不愁吃,女人啥事也能干,与男人一模一样的干。上山受苦来生产,走到学堂把书念,大脚参加自卫军,小脚参加慰劳队,男男女女都工作,生产劳动是第一,男人们前方去‘闹枪’,后方的生产靠婆姨。生产运动要号召,人人知名的毛主席。”^④

树立典型也是动员女性生产最经常性的做法之一,确定典型,总结经验,然后用其他各种宣传与组织的有力手段朝这个目标靠近,从而推进全边区范围的竞赛高潮。树立典型是开展工作的有效方式,“不论在农村、工厂、部队、机关,只要那里在群众中产生了一个劳动英雄或模范,经过我们发现,把他奖励宣传,号召大家学习,则那里的生产和工作,就会得到改进和提高。”^⑤

在延安政权初期,各地都积极推出与宣扬自己的生产模范,如某某在各种艰苦的条件下种地多少,某某在生产上突破了多少,等等,最后作为全边区认同与学习的劳动女英雄形象。到1942年,边区推选出了最有名的女生产英雄马杏儿、郭凤英等,她们很快成为全边区学习的楷模,并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村女性的生产积极性。志丹县胡老婆虽已56岁,但劳动力不弱于男子,她听说延安出了个马杏儿,便要同她竞赛,她种地23垧,还要照顾一个有抽筋病的儿子,今年还许下要缴公盐代金1800元,还参加变工队,同男子们一起锄草、收割,农闲时就纺纱,自己还要纺线十多斤^⑥;志丹县的刘金花、侯兰英“堪与马杏儿媲美”,刘金花没有牛犊,没有辅助劳力,但她说“我决不荒一垧地”;侯兰英丈夫死后,她就动手创家立业,就凭一把锄头挖地开荒15垧,还合伙喂一条驴,分担30只羊,喂养5头猪^⑦。

二

开展全边区大规模的妇纺运动是当时历史情境下发展的必然结果,既是中共革命的必然需要,也反映边区老百姓的心声。1939年后,随着国共关系的逐渐紧张,国民党对边区有意识地进行经济封锁,宣扬“一斤棉花,一尺布,一根针,也不准放进边区”。从洛川来延安的脚夫,经过封锁线时

① 《在生产战线上的志丹妇女》,《新中华报》1938年7月25日。

② 《巾帼不让须眉 大批妇女开荒》,《新中华报》1938年7月10日。

③ 胖胖《新春耕曲》(抗日小调),《新中华报》1938年2月20日。

④ 《陕北秧歌》,《新中华报》1939年3月31日。

⑤ 社论《采用新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解放日报》1944年9月5日。

⑥ 《志丹县胡老婆五十六岁 种庄稼廿三垧 参加男子变工队》,《解放日报》1943年4月20日。

⑦ 《志丹二区女劳动英雄》,《解放日报》1943年4月30日。

候,连牲口用帆布做的水桶、垫牲口驮鞍的棉花也被国民党的军队抢走了,女人走亲戚、回娘家,给小孩做的衣裳也不准带进边区,这显然加深了边区的困境。军队与机关人员需要大量衣源补充,老百姓也陷入深深的“穿衣”之虞。由于封锁,外边的布进不来,边区的布价很快就出现上涨趋势,如下图所示^①:

年份 布种	1937年	1938年	1939年	1940年	1941年	1942年
斜布每尺价	一毛至二毛	二毛至四毛	四毛至六毛	六毛至三元	三元至十元	十元至四十五元
洋布每尺价	八分至一毛五	一毛五至三毛	三毛至四毛	五毛至二元	二元至七元	七元至三十元
土布每尺价	五分至八分	一毛	两毛	五毛	一元至二元	三元至十二元

面对边区日益严重的穿衣问题,边区政府提议把农村女性解放与参加生产等经济行为紧密结合起来,将其引导到纺织的家庭手工生产中去。1939年初,边区建设厅指示,“除指导加紧农业生产外,同时也注意到农村手工业的发展”,“用合作社的方式,把农村妇女组织起来,进行有计划地发展纺织工业。现已指示延安等八县组织棉毛纺织生产合作社115所,这不仅是使边区棉花能够自给,同时也是动员妇女群众直接参加生产的良好方法”^②。

1940年后,日寇加紧了对各根据地的残暴扫荡,边区内部的经济更加艰难。1943年初中共发布指示,“战斗、生产、教育是当前的三大任务,而广大的农村妇女能够 and 应该特别努力参加的就是生产”,“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以达到解放的道路,亦须从经济丰裕与经济独立入手。多生产,多积蓄,妇女及其家庭的生活都过的好,这不仅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起重大作用,而且依此物质条件,她们也就能逐渐挣脱封建的压迫了,这就是在整个群众工作中广大农村妇女的特殊利益的中心所在,也就是各抗日根据地妇女工作的新方向。”并进一步规定了各地妇联会妇救会的工作中心,她们必须“要以研究组织农村妇女个体与集体的生产为首要工作,深入村庄,教育帮助与解决农村妇女参加生产战线中的困难,农村妇女生产工作的好坏,是测量妇女工作的尺度。”^③

怎样把妇纺运动推入到千家万户呢?中共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纺织可以增加家庭收入,改善生活,以帮助解决穿衣……她们是乐意参与纺织的,问题是在于用怎样的方式去组织她们,团结她们,教育她们。”^④培养典型,取得经验,然后利用强有力的组织力量加以推广,一直是中共取得成功经验的重要方法。延市南区有一个村子叫龙儿湾,没有纺织基础,出现了纺毛英雄李张氏,她感慨地说“人家妇女会这么辛苦地常来看我们,也是为了照顾我们,帮忙想办法,把日子过好。怕什么,让我先试试,只要毛能抽出,就可以纺。”她不但自己努力纺,还主动教别人纺,纺毛运动很快就发动起来了^⑤。

延安县柳林区二乡是边区妇女纺织运动中最成功最有影响的例子。在这个乡的南区,一年前还没有纺织,由于布匹的稀缺与涨价,在合作社刘建章主任的宣传与帮助下,难民石匠李国泰的妻子第一个从合作社借纺车纺纱,其所织的新衣服与所得收入吸引了其他的妇女,从而使纺织工作取得很大进展,这的确是南区合作社的经验。这种采取“大胆亏本”的策略,巧妙的宣传和健全的组

① 赵烽《延安县柳林区二乡的妇女生产——妇女参加生产的典型,妇女工作新方向的体现》,《解放日报》1943年3月8日。

② 《发展农业生产 动员妇女参加生产 边区建设厅的新计划》,《新中华报》1939年3月10日。

③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1943年2月26日),《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第648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185~186页。

④ 《扩大妇女组织》,《解放日报》1942年3月17日。

⑤ 王腾勃《龙儿湾的妇纺》,《解放日报》1943年7月6日。

织,“把妇女解放和妇女的经济利益在某种程度联结起来”,改善了家庭关系,合作社也更加发展起来^①。总结南区合作社发展的经验,有以下几点:第一,改变了工资上的平均主义,进行计件计质;第二,必须自愿与有利,同时配合以政治宣传和奖励,即经济刺激应多于政治动员;第三,提高质量为中心环节,应是打破工资上的平均主义;第四,推广妇纺的核心,合作社是最适当的组织^②。

南区合作社的经验很快在柳林区二乡推广,该乡在1941年底还只有50多个妇纺,到1942年全乡200余户全部学会了纺花。她们的实践是成功的,其方法就是:第一,纺纱妇女可以探买布(欠账)、探用钱,先穿了布或先用了钱,以后按数交线子;第二,领花、领车、交线子不要手续,只要确认为本乡妇女即可领用;第三,纺织妇女买布打折扣,比市场价低1/3;第四,根据市场价不断提高纺线的工资,去年1月份每斤花工资45元,12月份到了130元,使妇女们心悦诚服,提高了积极性;奖励加快速度,提高质量,采用各种奖励办法。总之,一个中心,“不怕赔钱,只要老百姓能攒钱”,老百姓是“不花本钱肯出力气,无本有利,妇女们万分欢迎”^③。

南区合作社的经验先推广到整个乡,再扩展到县,这种由点到线再到面的发展经验很快促进了延安县妇女纺织业的兴旺。革命以前,延安县的妇女是从来没有见过纺纱的,当然也没有看见过织布,群众除了种庄稼和赶些牲口,再也没有其他的生产事业,而这几年来却发生了巨大变化^④:

年份	纺织组	人数	纺车	纺纱(斤)
38	80	756	512	2268
39	98	849	621	2547
40	102	935	756	4002
41	130	1436	1164	11308
42		2241	1445	15679

在中共的宣传教育与引导下,边区妇纺蓬勃发展,神府县每天纺纱达900两,1941年已有纺妇300人,她们每人除可向政府领到一架纺织机外,凡纺纱(政府发)一斤,可得到酬劳小布四尺,所以推行颇为顺利^⑤。在边区的泰家山头,以前只有3人会纺织,1935年后由于河东洋布难以买进,不得不开始学习纺织,最近二三年来,“而个(现在)一尺洋布七八元,不学纺织,连鞋也穿不上。”同时她们有利可赚,花去成本与粮食钱,每个妇女每月纺纱可以赚得四五十元,织布妇女可以赚得90元左右^⑥。而在清涧县,纺织业成为农村妇女的主要副业,每到月明夏夜,到处纺织声相闻,在清涧4万妇女中,有一半从事这种劳动,纺车有10195架,织布机有2754架,1941年共织布92477丈,纺线126821斤^⑦。

绥德县成功地解决了妇女纺织中的纺线与织布的比例分布不平衡的问题,如郝家桥共有130个成年妇女,会纺线的有98个,会织布的只有21个,当她们知道共产党是为她们服务并为她们谋利益时,她们很快成立了纺织小组,纷纷学习村里的纺织模范高老婆、刘英珍。因为会织布的只占纺妇的五分之一,必须采用变工的形式才能解决,她们采取了几种形式:织布变纺线;织布变做工;织布

① 莫艾《一页妇纺发展史》,《解放日报》1943年2月28日。

② 伯森《妇女纺纱在南区——介绍南区合作社推广妇女纺纱的经验》,《解放日报》1943年1月28日。

③ 赵烽《延安县柳林区二乡的妇女生产——妇女参加生产的典型,妇女工作新方向的体现》,《解放日报》1943年3月8日。

④ 吴力永《延县的妇纺运动——写在“延安县过去经济建设总结和1943年经济建设任务”后》,《解放日报》1943年2月10日。

⑤ 《神府:妇女月纺纱九百两》,《解放日报》1941年11月14日。

⑥ 李英岚《泰家山头的纺织女》,《解放日报》1942年3月8日。

⑦ 《月夜到处纺织声——清涧半数妇女参加生产》,《解放日报》1942年7月18日。

变做针线。决定成立一个织布变工小组 4 人,由小组长协调和领导,以促进全村纺织的发展^①。事实上,到 1944 年,全边区的纺织运动达到了高潮^②:

年份 \ 项目	纺织妇女(人)	纺纱(斤)	织布(匹)
1942 年	88500	785831	14158
1943 年	172495	835894	35451
1944 年	213193	1660203	114497

在组织妇纺的过程中,中共成功将自己的意识形态输入老百姓的心中,加强了自己在老百姓心中的合法性地位。中共给广大农村妇女分了土地,奖励农业生产与纺织,并采取了一系列冲击传统封建文化遗毒的措施,尽管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性与不完善性,但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广大农村妇女的传统思想意识,其间涌现了一大批女性生产英雄与劳动模范,她们开始接触家庭以外的世界,逐渐有了属于自己的主体性话语。

三

女性生产运动政策制定以后,政治动员便成为关键所在。在边区农村女性的生产教育运动中,存在着一个特殊群体,即女性二流子。这个群体,泛指那些不从事生产、不务正业、好吃懒做的人,烟鬼赌徒,做坏事的人,在几乎人人参与劳动的边区,她们显然是众怒的对象。中共认为她们是好吃懒做、破坏社会的无用之徒,必须通过教育、改造的方法引导她们走上生产劳动之路。也只有发动这个特殊群体加入劳动生产行列,才能推动与促进整个边区的女性生产运动热潮。

一般来说,在 1942 年大生产运动之前,主要由政府承担着改造工作,但效果不佳。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认为,以前没做好的主要原因,“是我们还没有把改造二流子变成群众性的活动,始终局限于政府、干部与二流子的单纯对立,群众却站在一边看。”这次改造的方式是“民选二流子”,“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判定二流子最根本的标准是“看他们是否有正当职业和他对生产的态度”^③,从而在这个标准的基础上在全边区普遍开展一场改造二流子的政治性群众运动。

教育是基础与手段,而改造是这场运动中最重要特征。在对过去二流子改造的总结上,中共认为,“只有在生产劳动的锻炼中,二流子才会得到根本的改造”,“说明教育不一定对每个二流子都有效,因此还必须实行一些强制的和半强制的办法,例如由政府规定他一定的生产任务,按时检查,并指定好人监督他。”^④在延安市,据群众评选有男二流子 71 人,女二流子 39 人,市委开始时与公安局相配合,在生产动员大会上宣布二流子名单讨论,再根据地区情形,将二流子分成小组,每组选出一小组长,依照所订公约相互督促,规定生产期间,一切义务动员概由她们负责,二流子的门上和身上佩带以二流子的证章,只有在真正参加生产之后才可取消。在市委以及各区政府的劝导与组织之下,许多女二流子纷纷定出各人生产计划,并且开始早出晚归,如任贵英正准备纺线,张兰英、姬贵兰等纷纷开始制订生产计划,她们都热情地投入到生产运动之中^⑤。

① 绥德县妇联主任张力《绥德妇女纺织中的变工——从模范村郝家桥纺织小组谈起》,《解放日报》1943 年 5 月 7 日。

② 《陕甘宁边区的纺织业(1945 年)》,《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 3 编《工业交通》,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53 页。

③ 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谈农村二流子》,《解放日报》1943 年 6 月 4 日。

④ 社论《改造二流子》,《解放日报》1943 年 2 月 14 日。

⑤ 《党政协力劝导 本市二流子参加生产 男耕女织痛改前非》,《解放日报》1943 年 3 月 23 日。

在执行政策过程中,一些干部采取了更加直接的强制办法,凡见到二流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声嚷道“二流子,快,寻保人,写保条,订生产计划。你今年种多少地?说不然,就给你挂二流子牌。”^①由于女性更多地带有传统性别特征,大部分女性二流子在教育与恐吓声中早已按要求制订生产计划,但还有一小部分仍要作为二流子典型经过群众大会的批准,这道群众关使她们感觉非常羞辱与难熬。在甘肃六里庙乡群众大会上,一个叫冯老婆的女二流子,30来岁,早就羞得连头都抬不起来,在群众面前表示,“我改过,我自新,你们看到我再吃洋烟就活剥我……”群众不同意,于是她再三向群众表示愿意割麦纺花等,可寻保人时却没有人愿意为她担保,最后终于有一个人表示为她担保时,她感动得眼泪都出来了,“真……真的,我改过……”^②。

在强制她们劳动的同时,主动帮助她们,提高她们的生活,给她们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是这场改造运动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延安市妇联正赶制纺车一百架,兼向工厂领毛,供给女二流子及难民纺线之用^③。定边县在组织女二流子参加纺毛工作中,除组成小组外,由政府发给纺车及羊毛,纺成线后,即交工厂领工资。塞北工厂并派有专人,每日早上去各纺妇家,发给一斤二两羊毛,到晚上即又来各家收一斤毛线,并发给工资^④。这种提供帮助的教育与强制结合起来,是这次运动成功的关键。延县的高秀英是个女二流子,在反省中满脸通红地说“最初公家叫我纺线子,我一满解不开,到现在我三天已能纺一斤毛了,公家给我二等线子的价钱算,我收入加多了,我男人又开磨坊,两口子的生活现在已绰绰有余了。”^⑤

延安市对女二流子,规定要她帮助丈夫整理家务,使她受家人严格的监督。并按性别组成小组,选其中表现较好的为组长进行各种生产。在旧城里有一个叫任桂英的女二流子被选为组长,她能吃苦,也敢得罪人。她隔几天就跑到市政府领羊毛回来纺,起带头作用。她组里有王玉贞好吃懒做,抽大烟,不务正业,任桂英除报告给乡长外,还敢于在会议上当面指责王玉贞,并当场作了处罚,王玉贞终于知错改正^⑥。具有着倔强个性的姬富兰被选为有8个女二流子的组长,现在她已经每天纺线能达到四两的纪录,其他刚学不久的女二流子也能达到一两五以上。姬富兰自豪地说:“这几天我们已经纺了足够五斤线子,赶今年下来,不用言传也要赚它个十万八万。”^⑦

这次改造二流子运动比较具有普遍性,同时遍及整个边区。在以往的改造中,一些二流子逃到别的地方去躲避劳动,但这次不同了,全边区普遍登记、改造二流子。如定边苏明的女人在城市被登记为二流子后,为逃避生产,即躲到五乡,但在那里她又被登记为二流子,知无躲藏之路,才不得不回城市参加纺线^⑧。

在全边区,根据延安市的调查,1937年前全市人口不到3000,而二流子将近500,约占人口总数的16%。延安同时期人口约为3万,二流子为1692人,占5%左右。据此估算全边区140万人口中,二流子约占7万左右。经过改造,截至1943年初统计,全边区只有二流子9554人,到1943年底又改造了5587名,即改造了剩余数的58.8%^⑨。

① 杨向农《怎样改造二流子——延县蟠龙区动员二流子生产的几点经验》,《解放日报》1943年5月20日。

② 北群《改过——记甘泉六里庙乡动员二流子生产大会》,《解放日报》1943年5月20日。

③ 《党政协力劝导本市二流子参加生产 男耕女织痛改前非》,《解放日报》1943年3月23日。

④ 《定边督促二流子生产 男子打盐种庄稼 女的参加纺线》,《解放日报》1943年5月1日。

⑤ 《延县党员马占胜 教育二流子七人改过组成扎工队已开荒六十垧》,《解放日报》1943年5月17日。

⑥ 延安市委书记张汉武《谈延市二流子的改造》,《解放日报》1943年5月24日。

⑦ 王朗超《关于组织二流子集体生产》,《解放日报》1944年5月3日。

⑧ 《定边督促二流子生产 男子打盐种庄稼 女的参加纺线》,《解放日报》1943年5月1日。

⑨ 《边区二流子的改造》,《解放日报》1944年5月1日。

分 区	延属分区	绥德分区	三边分区	陇中分区	关中分区	共 计
原有二流子数	2653	4033	1120	1122	626	9554
改造数	1987	1626	880	700	394	5587

自 1942 年大生产运动裹挟而来的改造二流子的政治运动,很快传遍了边区的每个角落。1943 年年底,为了达到彻底改造的目的,延安市政府决定,“立即把延安市的二流子都组织起来,订出生产计划,使他们劳动,使他们能过好日子,这就是延安市人民踊跃明年生产运动行动的第一声。”12 月 10 日集中开会,女二流子杜芝兰表示“当二流子很不名望,我恨二流子男人把我害,公家现在来救我,请公家替我想办法,我劳动,我纺线,三天一斤。”她身边的十几个女二流子也纷纷表示悔改:再不惹闲人弄是非了,要好好劳动,做个好妇女。申大业说“我会缝衣服,一家三人都能劳动,每天我要缝一套衣服,我一定不要人家再讲我坏。”^①

对中共来说,改造二流子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它“不仅增加了生产战线上的力量,而且也减少农村中的坏人坏事,巩固了革命的社会秩序。”^②更重要的是,这次运动成功地体现了中共改造旧世界的信心与能力,在全国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树立了延安政权的光辉形象。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艰苦的工作,特别是对二流子的教育。”“人都是能进步的,现在的二流子,是因为过去在旧社会中不能受到好教育,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下,什么人都能学好,二流子也都变成好劳动。”^③

综上所述,通过对农村女性的生产教育及动员,中共相当程度上改善了广大边区女性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她们抗日的热情与生产积极性。而且,中共基本上赢得了边区女性的政治认同,巩固与加强了其在边区的合法性地位。然后经过生产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中共成功地整合了边区农村女性的力量,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后方根基。

(本文作者 湘潭大学历史系教授 湖南 411105)

[责任编辑:江俊伟]

① 《生产运动又一胜利 本市二流子纷纷转变 五十余人决心悔改参加生产》,《解放日报》1943 年 12 月 22 日。

② 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谈农村二流子》,《解放日报》1943 年 6 月 4 日。

③ 林间《把二流子变成好劳动——在延市二流子大会上所看到的》,《解放日报》1943 年 4 月 30 日。